

伊朗核问题态势透析

伊朗核问题决策
的基本路径与关键角色

高新涛

内容提要 伊朗核问题决策的正式机制是在核问题日趋激化情势下形成的，主要由领导委员会、决策委员会、专家委员会 3 个层级组成，首席核谈判代表统筹负责，决策的具体方式依问题性质而定。家族关系、亲属关系、同乡关系、相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与宗教倾向等社会关系构成主导伊朗核问题决策的非正式网络。正式的决策机构和非正式网络交相互动，错综复杂。因此，伊朗核问题决策并非外界想象中的非理性，最高领导人与总统等核心人物受到正式权力与非正式网络等多方面因素制约。

关键词 伊朗 核政策 决策机制 非正式网络
作者简介 高新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国家安全研究所讲师（北京 10087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缔造者霍梅尼在共和国的早期岁月一再把核武视为“魔鬼的工具”，这表明，在后革命时代初期，伊朗对发展核武不感兴趣。但是，在当今世界，不论伊朗是否有发展核武的意图，它已经走向核开发之路却是不争的事实。传统经典理论文献多经由伊朗核武器化的内在动因进而寻求伊朗核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但同样至关重要的是，观念与政策是在特定机制中形成的，唯有深入认识政治精英如何通过特定机制达成共识、进行决策，才能进一步准确地把握伊朗核政策的发展趋向与应对举措。本文试图透过伊朗核谈判过程中透露出的种种迹象，系统地勾勒出伊朗核问题决策的内在理路，即正式的决策机制与非正式网络的影响，进而深入探析伊朗核问题决策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及其变化趋向。

正式的决策机制

根据伊朗 1979 年宪法，国家高层领导是由一位根据伊斯兰法委任的最高领导人（他对国家的统治被定义为“教法学家统治”）和一位民选总统组成。最高领导人与神权势力相关，民选总统与世俗权力相关，神权与世俗权力在政治上双重互动反映了多重权力中心的存在，从而使伊朗政治体制呈现出高度派别化的特征。然而，伊朗的复杂政治体系和激烈派别斗争并不必定会损害核计划的决策。由

于核问题决策的高度秘密性与敏感性，使在核问题决策中正式起作用的个人数量极其有限，核决策常常局限于一个较小的组织之中。而且，事实证明，当涉及国家安全时，伊朗有一套严密的决策机制，使伊朗的决策者在关键时往往能够做出较为理性的决定。

伊朗前首席核谈判代表哈桑·鲁哈尼的谈话表明，2003年之前，伊朗原子能机构一直是负责处理同核问题相关的所有技术与政治问题的权威机构，外交部在关键时提供支持。伊朗原子能机构设立于1974年，约有200名科学家，该机构的核心职能是负责核燃料循环的研发。这项工作因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曾一度中断，1987~1989年，伊朗再度开始追求核燃料循环技术。¹然而，伊朗在向他国购买核技术时接连碰壁，当时的西方国家、苏联等国都不愿向伊朗提供核技术。所以，自1999~2000年起，伊朗国家领导人决定加大提升本国核能力的力度。为此特别赋予伊朗原子能机构之前所没有的一些权力，使该机构在借款、支出、采购和制度上享有更多自由，而没有受到官僚政治和规章制度的掣肘，由此引发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正在制造核弹的喧嚣。2003年5~6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首次正式讨论伊朗核问题。尽管没有通过决议，却激起了伊朗领导人深重的危机感，他们认为伊朗可能正面临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问题日益关注时，外交部与伊朗原子能机构之间就如何处理核问题出现了严重分歧。该机构认为，伊朗核问题不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下次会议上成功地解决此问题。外交部则强烈警告说，核问题仍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

为此，伊朗最高领导人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创建了3个专门委员会处理核问题，^④试图厘定相关机构的职责分工及其决策机制。最高层级是“领导委员会”(Council of Heads)，包括最高领导人、总统与鲁哈尼等人；第二层级是“决策委员会”(Policy-making Committee)，包括各部部长、最高领导人的2位代表鲁哈尼、拉里贾尼及其他列席者，如前外长维拉亚提和伊朗原子能机构主席。外交部长负责决策委员会和专家层级会议，同时领导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谈判；第三层级是“专家委员会”(Expert Committee)，由与核问题相关的不同机构的专家组成。^(四)

2003年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了针对伊朗核问题的措辞强硬的决议，并敦促伊朗加速与该机构合作，并补救决议中指出的不足。面对国际社会施加的压力和内部分歧，9~10月，伊朗外交与安全部门的精英们开始感到应由一个权威人物来协调相关机构，统筹负责核问题。当时的外长卡迈勒·哈拉齐(Kamal Kharrazi)推荐鲁哈尼担任这项工作，但是鲁哈尼当即拒绝了，并建议由外交部负责，同时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支持。关于核问题负责人的人选问题讨论了近一周时间。鲁哈尼后来在2005年7月23日接受伊朗《世界报》一名记者(Kayhan)采访时说，最高领导人与总统坚持让他负责这项工作，他不得已接受了。鲁哈尼之所以不愿接受此职位，在于他深感此职位责任重大，并将冒着失去个人地位和声望的风险，尤其是他深知国内一部分人有可能采取使危机失控的激进立场。他无法预知相关政府部门是否会与他进行全面合作。之后，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欧盟的核谈判中，鲁哈尼又被任命为首席谈判代表。这表明在伊朗的核问题决策机制中，3个层级的委员会，特别是首席核谈判代表的地位和权威得到提高，而原子能机构和外交部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

虽然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鲁哈尼被赋予了处理核问题的空前权力，但在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他仍要交由“领导委员会”作出定夺。例如，2003年10月，伊朗暂停了纳坦兹的核活动，随后在2004年2月，依照《布鲁塞尔协议》伊朗将暂停的范围扩大到离心机部件的生产与组装。欧洲三国外长承诺在2004年6月召开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峰会上结束谈判，而此后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使欧洲

¹ See Hassan Rohani, "Beyond the Challenges Facing Iran and the IAEA Concerning the Nuclear Dossier", FBIS- IAP20060113336001.

^④ 依照伊朗宪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协调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一切活动。它由总统、2名领袖代表、司法总监、议长、军队总司令、卫队总司令、国家计划和预算组织主席，且有外交、内务、国防及情报部长组成，该委员会的决议在实施前须经由最高领导人批准。

^(四) See Hasan Rohani Interviewed on Nuclear Negotiations, July 26, 2005, FBIS Translated Text.

人从原来的承诺上出现了退缩。6月底,伊朗在未能说服国际原子能机构结束核查的情况下,宣布在暂停铀浓缩活动的同时,恢复离心机的组装。11月,在巴黎协议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再度暂停核活动,暂停的范围第三次扩大。伊朗谈判小组就对话中的关键问题如暂停范围、时间等展开了多次讨论。同时,在巴黎起草协议文本和参与谈判的伊朗专家时刻与在德黑兰的鲁哈尼保持联系。当谈判结束准备签字时,鲁哈尼告诉谈判代表坚持什么也不签,并将协议的文本送交德黑兰,同时告诉欧洲人签署最终协议尚待德黑兰的批准。鲁哈尼坦承,“我感到这一问题极端重要,并不是我独自可以做出最终决定的事情。”¹ 最终领导委员会决定签订协议,并向欧洲人阐明了伊朗对协议的理解与解释。

这表明,在伊朗的核问题决策中,最重要的决定通常由领导委员会做出。“实际上,所有重要的、战略性的决定和根本原则都要由领导委员会批准。”鲁哈尼说,“决策委员会的决定在实施前也要向最高领导人和总统报告。”^④

领导委员会虽是最终裁决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独裁者,对核问题的决策往往是建立在下层机构充分讨论基础上的,领导委员会的职责是在众多不同意见中权衡、取舍,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如伊朗应当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完全合作的决定是自下而上达成决策的;2005年8月8日,在恢复伊斯法罕的铀转化活动问题上,有许多分歧意见,专家委员会做出了恢复的决定,并随即得到了领导委员会的批准。即在大多数情况下,核问题决策是由下而上形成的。针对个别特殊问题,则由领导委员会主导做出决定,如核燃料循环须被视为伊朗的“红线”的决定就是由领导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讨论达成的。也就是说,伊朗核问题决策的具体方式无一定之规,是由上到下、还是由下而上,需据问题的性质而定。

除此之外,2006年6月25日,伊朗最高领导人设立了对外关系战略委员会,其成员包括5位前高官:前外长哈拉齐、维拉亚提、前国防部长沙穆哈尼(Ali Shahrkhan i)、前商业部长沙里亚特曼德里(Shari'atmadari)、前驻华、驻沙特大使塔瑞米(Hossein Ta'mini)。前三位被视为温和派,后两位则被视为保守派。其成员选择类似于一个完整的内阁组成,包括军方人士、经济专家、政治、文化、外交人士等。有人评论说,该委员会的丰富经历胜过了内贾德外交团队的年轻和缺乏经验。^(四)那么,该委员会在伊朗核问题上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呢?在一次采访中,沙穆哈尼强调说,它不会就核议程的“日常问题”做出决定,而是旨在聚焦于伊朗长期的核战略。^五另一份报道解释说,“一般情况下,核问题通常是由相关组织做出决定;但当伊朗的核战略超越常规框架时,如超出了安理会和5+1(即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这一委员会将参与处理。^六从该组织迄今为止的运作情况看,它目前更多的是充当长期战略事务顾问的角色,但不排除随着伊朗核问题的日益升级,哈梅内伊会转向该委员会寻求一种更为平衡、谨慎的声音来处理危机,而不像内贾德那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诉求。它也可充当最高领导人寻求妥协时与西方进行沟通的幕后渠道。

影响决策的非正式网络

哈佛大学坎特教授早在1977年就指出,“在正式的组织图表背后有另一个上演权力戏剧的影子结构。”^七她敏锐地指出了非正式结构存在于更为明显的正式结构的影子中。社会学家将这样的非正式

¹ Hasan Rowhani Interviewed on Nuclear Negotiations op. cit

^④ Ibid.

^(四) See Bill Sanjii “Iran Foreign Policy Council Could Curtail Ahmadinejad's Power” RFE/RL, June 29, 2006.

^五 See Role of Iran's new Foreign Policy Council in nuclear debate still in flux WMD Insights November 2006.

^六 See “Strategic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genda: The Future Iran”, E'temad-e Melli October 18, 2006 OSC document IAP20061019513003, http://www.wmdinsights.org/II0/II0_ME4_RoleOfIran.htm.

^七 Kanter R. M., 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 164.

结构定义为非正式网络，即人们用以交换资源与服务的关系网。¹ 非正式网络基于个人的社会关系，非正式网络与正式结构的区别在于，它不被组织正式承认或批准，成员间交换的内容可以是与工作、个人、社会相关的多个领域。在政治背景下，指的是隐匿在政府组织背后非正式的、通常易造成分裂的个人或组织形成的关系网。从结构上讲，非正式网络有若干节点（行为体或单元），一个节点可以是一个或多个人，甚至整个群体，这些节点通过他们间的社会关系连接在一起，同时，节点本身也可以充当其他节点之间的桥梁或沟通者。

识别目前伊朗政治与社会网络中的这些节点及其相互关系极为困难，因为伊朗学者的相关作品相对有限。但是，从有限的文献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家族关系、亲属关系、同乡关系、相同的教育背景与宗教倾向等社会关系使不同机构的个人联结起来，并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是伊朗社会内部权力共享结构的深刻根源。这些非正式网络在军事、政治、经济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在许多方面比正式的决策结构更有影响力。^④

由各种关系构成的非正式网络重要性的例子在近年来的伊朗不胜枚举。抵抗军司令官、准将希查斯（M ohammad H e j a z i）的一个儿子帮希查斯管理最高领导人的办公室。前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长莫哈杰拉尼（A t a o l l a h M o h a j e r a n i）的妻子是一名议员。前首席核谈判代表拉里贾尼拥有显赫的身世和丰富的政治资源。他的父亲和岳父均为阿亚图拉，即仅次于大阿亚图拉的最高级神学人士，拉里贾尼有3个兄弟，其中马哈茂德·贾瓦德曾任副外长，现任司法副总监；萨德赫为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法泽尔是资深外交官，现任伊朗驻加拿大使馆文化参赞。显然那些重要人物在相关各部门都有亲戚、朋友和门徒。还有许多人曾一起秘密从事反对国王的斗争，有共同的革命经历，有的还是患难与共的狱友，有的来自同一所伊斯兰教学校或神学院。例如，情报和安全部门的很多高级骨干来自圣城库姆的一所高级神学院。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多在早年参加过革命或战争。而且，许多卫队指挥官是来自宗教家族并与其他宗教家族通婚。内贾德总统提名的阁员中有多位曾是革命卫队成员或是校友，这使一些议员们产生抱怨，^⑤ 因此，家族、宗教、地缘关系和革命经历成为在军政界发展的重要资本。

这些非正式的网络在每周五祈祷会前后运行，通过家族聚会或家族中的重要事件（如生孩子、结婚、葬礼等）为指挥官和政治人物提供非正式却是有效的交流方式。正如布赫塔所言，“伊朗政府的成功运转经常受这些非正式网络的支配”^¼。这种多层次和复杂的非正式网络，涵盖了具有不同宗教、派系、教育、革命、家族、亲属等背景的各种组织与个人，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像一只无形的手”，左右着伊朗的政局乃至安全与外交决策，使伊朗的重大决策往往是各方同意的而非单边决定的，非正式网络经常超越正式的制度结构，助长了伊朗决策体系的秘密性和决策的间断性，这正是伊朗核问题决策中近乎于多变的深层动因之一。

决策的关键角色

由上述可见，在伊朗的核决策过程中，正式决策机构和非正式网络的互动错综复杂，使任何政治派别、组织与个人难以完全由一人定乾坤，即使最高领导人也不例外。尽管最高领导人有最终的决定权，但他也需要在核政策问题上寻求主要政策行为体之间的共识。总统、首席核谈判代表、革命卫队、议会等都遵循这一规则来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¹ See P. Marsde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Sage 1982, p. 12.

^④ See van den Bos, M., and W. Achbari, *Cultural Migration: Networks of Iranian Organizations in The Netherlands*, *Migration Letters* 2007, 4 (2): 171–181.

^⑤ See *Presidents cabinet choices could encounter resistance*, *A Weekly 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and Pertaining to Iran*, August 15 2005, Volume 8, Number 32.

^¼ Wilfried Buchta, *Who Rules Iran?*,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1, p. 7.

追求核技术与核能力是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矢志不渝的坚定目标，但面对国内外压力，他也不得不采取灵活的策略，甚至在一些关键问题的决策上有时显得力不从心。比如，鉴于伊朗严峻的经济形势，哈梅内伊在 2007年初命令其代表出售国有企业——电话公司、3家银行、数十家小型石油和石化企业。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其部属无动于衷。哈梅内伊召集了一次非常会议。总统内贾德及其阁员、重要教士、议会和各省、国家广播公司和商会的领导人悉数到会。哈梅内伊要求他们通过法令，迅速出售那些公司。他宣称“那些敌视这些政策的人是害怕将会失去其既得利益和影响力。”¹但在其严厉谴责 9 个月后，240 家目标国有企业中仅有 2 家被出售。这表明，尽管政府权力仍被牢牢控制在什叶派教士手中，但是，权力也正日益被分散于相互争斗的精英中间，他们处于一个伊斯兰法和世俗法定义的微妙制衡体系中。尽管哈梅内伊有至上的统治权，但也无法随心所欲地推动经济改革。显然，在核问题上，最高领导人的决策也无法摆脱各种政治势力的牵制和影响。

就总统而言，内贾德似乎正在核问题上行使相当大的权威。与其前任哈塔米相比，由于右翼和军方的支持，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内贾德将总统权力发挥得相当充分。哈塔米则是采取谨慎的方式处理核问题，他的战略是“不要让我们受制裁和孤立，即使这意味着我们的核计划推进缓慢甚至停滞”；而内贾德则采取较为激进的方式，正如一位伊朗分析家所言，“现在我们完全改变了，伊朗现在的基本战略是，我们要推进核计划，希望并尽力避免严重的惩罚。然而，尽快在核技术权力上取得进展与核计划不被冻结是首要的目标。这是内贾德掌权以来的一个显著区别。”^④

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内贾德一上台就由保守的拉里贾尼取代温和的鲁哈尼担任首席核谈判代表，在 2007 年 10 月进而由其密友贾利利取代了拉里贾尼。但是，内贾德在核政策问题上遭到了务实派的强力抨击，他坦承在铀浓缩问题上，“国内因素”的破坏作用比外来威胁严重得多，“国内批评者定期向敌人泄露伊朗政府内部的情报，政府已掌握部分人的对话录音，其中有人对敌人说：你们为什么不采取行动？为什么不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为什么不施加更大压力？你们应该立即采取高压政策，迫使他们退缩。”对此，内贾德严厉地发出了警告。^⑤但不久内贾德暗示的一名嫌犯就被宣判无罪。这显示了总统权力的有限性和受到国内各种势力牵制的复杂性。在核问题上，内贾德尽管极大地凸显了总统的发言权，但显然仍难以摆平伊朗国内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

首席核谈判代表在核问题上的显著作用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特别是哈塔米时期的鲁哈尼更是如此。依照一位接近伊朗外交机构的分析家的话来说“鲁哈尼是伊朗对外政策中的强人。他是一位能够娴熟地处理外交问题的复杂人物。面对问题，他从未采取意识形态的观点。他也充当知识界和国家力量与保守和激进派之间的平衡者。”^{1/4}但改革派仍然认为，选择鲁哈尼是一种妥协。尽管他在核问题上立场温和，但是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的职能显然是对外交部和行政机构的干预。而接替鲁哈尼的拉里贾尼则谴责鲁哈尼在核谈判中的让步是“拿珍珠换棒棒糖”，认为“我们需要核技术，但这决不能用像允许伊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或出售新型飞机这类承诺来交换。”^{1/2}不过，尽管拉里贾尼反对彻底中止铀浓缩活动，但在处理核问题的策略层面同内贾德总统和外长穆塔基有区别。相对于后者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他一直主张以适度让步为核计划换取更大的回旋空间，因而赢得了伊朗国内外的普遍赞誉。

其后，外交部副部长贾利利接替了辞职的拉里贾尼。贾利利与内贾德同为德黑兰工业科技大学校友，都参加过两伊战争，关系非同一般。他坦承：“总统在外交部的代表是外交部长，他们两人关系

¹ Borzou Daragahi, *Infighting rules Iran's power elite*, The Seattle Times, January 1, 2008.

^④ Iran's President Flexes Political Muscle in Nuclear Issue, <http://payvand.com/new/s/06/jun/1117.html>

^⑤ See Ahmadinejad steps up rhetoric against critics at home with threat to expose 'traitors', The Guardian, November 13, 2007.

^{1/4} Iran's foreign policy & its key decision makers,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new/s/iran/2005/iran-050809-ferd02.htm>.

^{1/2} Swapping a pearl for a candy, <http://www.tpncafe.com/story/2006/1/23/164618/167>.

很好……可能因为我与总统认识时间更长，我们两人观点又很接近，别人才有这样的看法。”¹ 因而，贾利利出任首席核谈判代表一职意义极为重大，它不仅表明了最高领导人对内贾德强硬立场的支持，而且，也使与核问题决策相关的重要人物——哈梅内伊、贾利利、内贾德、外长穆塔基等立场接近，态度更为鲜明，决策更为顺畅，协调力度进一步加强。

像其他政治组织一样，革命卫队需要争夺自己的发言权。从正式决策程序的角度说，革命卫队是通过其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资格与投票权来影响决策的。然而，在过去几年中，革命卫队及其准军事部队巴斯民兵更多的是通过其媒体、每周五祈祷会等非正式途径干预国家安全决策。卫队领导人经常对周五祈祷会致辞，并在会上广泛地讨论各种政策问题，旨在主导舆论走向与获取民意支持。他们利用接近最高领导人办公室的机会，主动向最高领导人及其核心幕僚建言，同时还通过与在什叶派圣城库姆的保守教士的联系发挥影响力，这些教士在政府各部门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卫队领导人还常就国家安全问题发表声明和对总统提出警告。相比之下，正规军无法以这种方式自我表现。

近前内贾德总统的内阁部长中有 5 人是革命卫队成员。有超过 80 名伊朗议员是革命卫队成员，几乎占了议员总数的 30%。在 28 名省长中有 11 人是革命卫队成员。革命卫队成员中有 34 人出任伊朗驻外大使。现任卫队司令贾法里跟哈梅内伊私交甚好，长期以来为哈梅内伊所赏识。并在伊朗核危机久拖不决、美国鹰派磨刀霍霍的情况下，接受了最高领导人关于如何让部队尽快由和平时期转入战时的研究任务。贾法里与最高领导人关系密切势必进一步加强革命卫队在核问题上的发言权。早在 1997 年，军事和教士精英就联手对改革派吸引外资的举动给予了沉重打击。在哈塔米政府与土耳其签署管理德黑兰的新机场协议后，革命卫队在剪彩仪式期间发动突袭，关闭机场并宣布协议无效。这足以显示革命卫队在伊朗重大决策与行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外，议会和公众舆论对伊朗的核问题决策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对于议会的影响，国外学者的争议较大。有人认为，议会的作用至多有 5%，而有人则认为，议会的影响力取决于它试图施加影响的强度，有时即使最高领导人也必须接受议会的决定。^④ 但是我们对议会的影响力不能估计过高，如 2000 年 8 月初，伊朗最高领导人就否决了议会通过的关于改革出版法的决议。在事关伊朗国家安全与尊严的核问题趋向升级时，并不排除最高领导人采取此类激烈手段。伊朗领导人对公众舆论也相当重视。一些民意调查表明，超过 80% 的伊朗人支持发展民用核能。^⑤ 因而，尽管伊朗各政治派别对推进伊朗核计划的战略、策略存有分歧，但各派政治精英都深刻认识到，公众对伊朗核计划的高度支持使政府很难公开对西方做出让步。任何重大让步都会被公众认为是对波斯民族的羞辱。在签署《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问题上，部分人甚至认为，接受议定书就等同于叛国。对此，鲁哈尼深感忧虑地指出：“公众对核问题非常敏感，无论我们做什么，必须取得公众的支持……如果国家的政治决策与公众舆论相冲突，肯定会遇到麻烦。”^⑥

显然，伊朗在核问题的决策上既有一套严密而又层级分明的决策机制与程序，又无形中受到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的影响。尤其是核决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角色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由于伊朗核问题决策的性质与政策环境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密切关注伊朗高层领导人的公开谈话与有限的公开争论，是我们识别伊朗核决策与核政策演化的重要途径。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赵 苹)

¹ Larijani successor Jalili is Ahmadinejad ally, Khaleej Times Online, October 20, 2007.

^④ See Iran's foreign policy & its key decision makers.

^⑤ See Iranians defend nuclear rights,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7, 2006.

^⑥ Hassan Rohani, "Beyond the Challenges Facing Iran and the IAEA Concerning the Nuclear Dossier".

Japan' s Diplomacy toward Africa and the Trend of Its Development

Luo Junbo

pp. 30– 35

Considering the general goal to be a “ political power”, Japan' s diplomacy towards Africa has gradually transferred from economic concentration to all– sided participation with the strategic target to expand economic benefits, raise Japan' s position as a political power and enhance its soft power. To realize such targets, Japan has long been offering aid

to Africa, actively initiating multilateral cooperative mechanism on Africa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introducing Japa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and value to Africa. Japan– Africa relation will, to some extent, develop continuously in the future and Japan' s African diplomacy will maintain and enrich its political background.

The Basic Approach and Key Role in Iran' s Nuclear Decision– Making

Gao Xintao

pp. 42– 47

The formal decision – making mechanism of Iran' s nuclear issue was formed in the situation when the issue was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It is composed of leading committee, decision – making committee and expert committee, with the chief negotiation representative taking charge in general. An informal network dominating Iran' s nuclear decision – making is formed and based on family relation,

relative relation, townee relation, simila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religious attitude. The formal decision – making organs and the informal networks interact complexly. The Iran nuclear issue decision – making is not so irrational as people perceive. The top leaders and the president have been conditioned by the formal power and informal relation network in making their decisions.

On the Middle East Civil Societys and Their Features

Yao Daxue

pp. 64– 70

The Middle East civil societies are well– organised social structures while practising their modern political function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Arab– Islamic cultural background, autonomously and of their own accord. They are mainly composed of such non– state players and 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s political parties, commerce unions,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social development societies and

some other interest groups. The Middle East civil societies exist objectively and are getting to their maturity along with the modern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he region. Civil societies are mos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mocratization progress in a nation. It is the common task for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civil societies and states.